

第一章 大国的盛衰： 世纪竞争与较量

回顾和考察历史上大国的盛衰演进过程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相对领先地位和竞争实力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纪录表明，大国的盛衰与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曾拥有过经济科技的世界领先水平。在科技发明、技术创新、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繁荣等方面，处于世界无与伦比的领先地位，成为国力强盛、惠泽四方的世界级大国。后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变革，科技进步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中国科技比较优势在各类因素的桎梏下，逐步消失。加之近代科学革命中，错失良机，结果是后来者居上。西方国家得益于科学革命的成果，实现了经济起飞，最终完成了工业现代化。而中国这个有数千年领先于世界、曾经极度辉煌的文明古国，却倘佯于世界近代工业化潮流之外，进入了由强

到弱，由盛到衰的落伍民族的行列。19 世纪英国成为了主宰世界的经济强国。20 世纪英国盛极而衰，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大的美国。作为盛衰更替的大国历史经验和发​​展现象，以及大国盛衰因由和未来走向，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本章通过对大国盛衰变迁的多维透视，以及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经验的总结，重点考察和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盛衰演变的各种因素，系统分析和重点比较了西方世纪大国的盛衰演变过程和特点，具体总结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基本经验，以期对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提供有历史价值的重要启示和大国兴盛的基本依据。

第一节 中国兴盛回顾的历史启示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和繁荣强盛的时期。中国的秦汉和唐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国家。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安定，民众获得休养生息，经济社会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而到了唐朝，中国进入了国家强盛，经济社会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当时的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领先的地位。

以文明古国而自豪的中国，其文明发展比欧洲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

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有优势。’^①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成为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对人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

中国曾经是科技强国。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在世界科学史上有着灿烂辉煌的一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学、地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以及农业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中国秦汉时期的冶金技术比欧洲要早 1600 年，公元 132 年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比欧洲早 1700 多年。中国在对多种天象的最早观测记录，天体测量，天文仪表等项成果，以及数学方面最早发明的十进位制记数法等达标方法，地学方面地貌学研究、石油发现、机械发明技术等，以及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医学等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见表 1—1 所示）。科学技术发明的超前比较优势，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比西方有更强大的竞争优势。“没有哪个国家堪与中国的力量匹敌。如果当时有一个国家会征服世界，那一定是中国。”^②

中国曾经是经济强国。中国科学技术具有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使中国经济在当时空前繁荣和强盛。中国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以及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农业发展水平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有关资料显示，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黄河下游的小麦亩产已达 200—250 斤，而公元 1 世纪意大利的粮食亩产才 70 斤；中世纪后期（1400—1449 年）英国大麦、燕麦的亩产只有 110 斤而两宋时期（960—1279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美] 莱斯特·瑟罗：《21 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表 1-1 中国古代发明的机械与技术

名称	西方落后于中国的 大致时间(世纪)
龙骨车轮	15
石碾	13
用水力驱动的石碾	9
水排	11
风扇车和簸扬机	14
活塞风箱	约 14
提花机	4
缫丝机(使丝平铺在纺车的转轮在 11 世纪时 出现, 14 世纪应用水纺车)	3—13
独轮车	9—10
加帆手推车	11
磨车	12
拖重牲口用的高效马具: 胸带/套包子	8/6
弓弩	13
风筝	约 12
竹蜻蜓(用线拉)/走马灯(由上升的热空气流 驱动)	14/约 10
深钻技术	11
铸铁	10—12
游动常平悬吊器	8—9
弧形拱桥	7
铁索吊桥	10—13
河渠闸门	1—17
造船和航运的许多原理	多于 10
船尾的方向舵	约 4
火药/用于战争的火药	5—6/4
罗盘(磁匙)/罗盘针/航海用罗盘针	11/4/4
纸	2
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金属活字印刷	10/6/1
瓷器	11—13

资料来源 武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辽宁教育出版社第 11 页。

年)，中国水稻平均亩产已达 300 斤。至明清时期（17—18 世纪）中国的水稻平均亩产最高已达 450 斤，而大约 1—2 个世纪后，日本的水稻亩产才只有 400 斤。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使 11 世纪末期的中国冶金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仅中国华北地区冶金业年产量约达 12.5 万吨，这个数字远远超过 700 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全部产量。^① 为日本 1890 年生铁产量的 6.25 倍，为意大利 1890 年生铁产量的 12.5 倍。直至 19 世纪初，中国仍然保持着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1750 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超过整个欧洲的 41.4%，超过日本 7.6 倍，为英国的 17.2 倍，美国的 328 倍。1800 年—1830 年，中国工业生产份额仍为世界首位。为美国的 12.4 倍，日本的 10.6 倍，英国的 3.1 倍，整个欧洲的 87.1 倍。到 1860 年，中国工业生产份额虽然遭到内忧外患的冲击，但仍为整个欧洲的 37%，为日本的 7.5 倍，美国的 2.7 倍（参见表 1—2 所示）。

表 1—2 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1750—1900 年）单位 %

	1750 年	1800 年	1830 年	1860 年	1880 年	1900 年
（整个欧洲）	23.2	28.1	34.2	53.2	61.3	62.0
联合王国	1.9	4.3	9.5	19.9	22.9	18.5
哈布斯堡帝国	2.9	3.2	3.2	4.2	4.4	4.7
法国	4.0	4.2	5.2	7.9	7.8	6.8
德意志诸邦/德意志	2.9	3.5	3.5	4.9	8.5	13.2
意大利诸邦/意大利	2.4	2.5	2.3	2.5	2.5	2.5
俄国	5.0	5.6	5.6	7.0	7.6	8.8
美国	0.1	0.8	2.4	7.2	14.7	23.6
日本	3.8	3.5	2.8	2.6	2.4	2.4
第三世界	73.0	67.6	60.5	36.6	20.9	11.0
中国	32.8	33.3	29.8	19.7	12.5	6.2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	8.6	2.8	1.7

资料来源:《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曾经是贸易强国。中国古代科技经济的强国地位,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在两汉时期就是航海大国。西汉时期开通了“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通道连接起来。而进入唐朝,中国国势强盛,经济发达,政治统一,对外关系空前发展,对外贸易有了更大的拓展。唐时的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据《国史补》载:“南海船,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的、昆仑等舶,不计其数,扬州和广州都特置市舶使。扬州比广州更繁荣,有大食、波斯商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对外贸易也促使航海业的发展。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的繁盛无比。中国大量出口丝织品、瓷器等大宗货物,也到国外投资建厂。据考证,唐朝时中国人曾在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区开设铸铁厂,对各国经济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经济繁荣,国威远扬,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据史书记载,仅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学生、学者附使船同来中国。如 653 年—843 年,仅日本派出使船附留学生、学者就有 2007 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留学生、僧徒也不在少数。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至佛教及各个宗派,大体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

船经常往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至数十次。^①到了宋元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沿海、沿江造船业的发达，使对外海运交通仍保持相当的实力。宋元时期的泉州、广州、明州（今日浙江宁波）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汗八里城大都居民殷富”；“市场上百货云集，只是丝一项每天进城的就有一千辆车之多”；“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在泉州附近至今存有港口、船坞遗址，伊斯兰教寺院遗址和阿拉伯等国人的坟地，以及记载中外往来的碑刻等，说明当时泉州对外贸易、交通发展的盛况。明朝时的中国仍然是富强之邦，许多外国使臣、商人往来于中国访问、贸易，加上指南针等科学技术用于航海业，进一步促进对外经贸和对外往来的发展，1405年至1433年，明成祖派遣郑和率当时世界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七次远渡重洋，比哥伦布的探险早60年，比达·伽马早70年。他的船队由260余艘船只和2.7万人组成，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地区，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作为科技、经济和贸易强国，曾在世界历史上拥有繁荣强盛的领先地位。但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国家，又为什么面对近代世界的挑战和机遇，古代中国的光辉让位于近代的屈辱，从“天朝上国”的峰巅跌入落后挨打的谷底，陷入落伍民族的悲剧？以盛唐为例，我们怎样从大国强盛的历史总结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呢？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一、以史为鉴 改善政治 励精图治

隋朝的盛衰兴亡，对唐是一面宝鉴。唐太宗经常对朝臣们回忆隋朝兴衰的情景，他认为：“人君靠国家，国家靠民众，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他告诫儿子：“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他主张：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要轻徭薄赋，使农民能够生产有时，衣食有余，统治才能巩固。为推进政治改善，唐太宗善于纳谏，重视用人，他赞称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魏征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见解，认为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魏征病故，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唐太宗不仅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善于纳谏的人，而且也是历史上能知人，又能用人的少见明君。他认为，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重要标志。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认为“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他在即位时，申明用人规矩：“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大小。”

善于纳谏和知人善任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通过纳谏和知人善任，唐朝制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建立起一系列制度和法规，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和各民族间矛盾的政策，使唐时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和武功都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二、重视农业 发展工商经济

唐朝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而唐朝农业的兴盛又与采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有关。均田制实行后，农业工具和技术也不断提高，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创造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兴建了水利设施，并开垦了大批荒田唐朝中期，农户数比唐初增加了两倍以上，达到九百多万户。均田法和租庸调制的实施使农业生产的趋势不断增长，繁荣强盛的唐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唐中期起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工商业得以空前兴盛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尤其是私营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织纴业、染色业、坑冶业、造船业、磨面业、印刷业、造纸业、制糖业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都有较大商店。唐都长安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为经济商业交流中心城内有东、西二市，人口约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繁荣的商业区对加强全国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的商贸往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

唐朝‘贞观之治’时期按照‘中国既安 四夷自服’的方针。强调安定团结，民族和睦唐太宗的执政时期，采取缓和民族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极大的成效唐太宗认为，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有国家，对少数民族主张安抚和持平 因此 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对外强调维持国家的统一。唐初，东突厥

不断发兵南下，成为威胁唐朝统一的强敌。唐太宗亲率大军大破东突厥，在东突厥旧地设置都督府，任命突厥人做都督，管理突厥事务和各部，后又统一西厥地区，并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统率几万边疆守军，以巩固边防和维护中西陆路通道。

722年，唐政府又任命黑水靺鞨首领为勃利州刺史，后又设置黑水都督府，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内地与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唐初，中央政府还加强了与南诏的关系。738年，唐朝任命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合并了其它部落。在内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南诏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唐太宗应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请求，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唐蕃联姻后，松赞干布大规模吸收汉族先进技术和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821年唐蕃关系更为密切并以唐蕃会盟“患难相恤 暴掠不作”永远和好相处。

唐朝前期，由于强调国内政治统一，安定团结，境外与邻国友好相处，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使唐朝长时期保持和平安定的状态 经济社会空前繁荣 呈现出中国有史以来的“盛唐”景象。

四、推进对外开放 促进中外交流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进入强国富民时期，因而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也达到极盛时期。唐朝国都当时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交通发达、文化繁荣、宾客如云的大都市。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经贸交易的中心。国外使者来长安者 络绎不绝。唐时中日友好往来出现高潮 大批“遣唐使”前往会集长安；中国使者也应日本邀请，东渡日本，积极传播唐朝文化、科技和管理。日本按照唐朝制度，改革行政制度，实

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并学习吸收中国建筑模式，以及中国文字、习俗唐朝和印度半岛各国，以及西亚欧非各国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和使臣有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吐火罗（阿富汗）、拂菻（东罗马）、日本、高丽等国。还集留有大批学问僧和求法僧、乐工和舞士、商人等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空前，反映出当时中国在世界的开放程度，以及对外交流的“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盛况和国际

列举以上中国唐朝时期强盛繁荣的情景和成功经验，无非是在说明，中国在历史上毕竟有过雄居世界的中国世纪。中国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和繁荣后，因盛世的骄奢、政治腐败、赋役苛重、连年灾荒和战争不断，以及丧权辱国等，使其由一个曾以文明、繁荣、强盛著称世界的大国，在世界的地位跌入低谷，沦为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掠夺和蹂躏的弱国，开始了百年挨打的屈辱历史。但明智的历史学家、战略家和政治家都认为，历史的潮起潮落，将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在近代落后的低谷徘徊后，会再度崛起升腾，再现中国历史曾有过的繁荣强盛。

尽管对中国盛衰史可以做出许多的阐释，但不可否认，历史上中国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的保守思想作祟，统治集团的腐朽与分裂；科举制度中权力阶梯诱惑。对爆发科学革命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储备的阻遏，以及闭关自守，人口增长对农业的压力，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等等。简言之，是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以致倒退。中国能否完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由衰至盛的奇迹？这显然取决于一个有助于加速经济崛起的，政策连续和极富远见的发展战略，取决于在历史的总结中汲取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

的确 在中国走向 21 世纪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兴盛衰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探究和高度重视。

第二节 盛极而衰 西方大国的盛衰透视与分析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的近代崛起打破了大国力量对比的格局，经济上飞跃发展与科技文化的广泛交流，使世界进入盛衰交替的历史时期。

一、西方大国缘何变得强大

伴随中国盛衰的历史演进，是西方国家工业化革命及其经济扩张产生的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显然是制度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技术革命使生产力的惊人的提高。16 世纪到 18 世纪西方以西欧各国为代表开始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相继交替登上西欧的霸主地位，完成了新兴国家争雄称霸的盛衰交替。但是，只有英国成功地完成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换。18 世纪 50 年代和 19 世纪 30 年代之间，英国实现了工业革命，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在世界工业的份额不断递增。其人均工业化水平和国家财富也同步增长。1750 年时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的份额还微不足道，而到 1860 年已获得工业化收益的明显回报。到了 1860 年后 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达到鼎盛时期。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 53%，煤的

产量占世界的 50%，其现代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 40—45%，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 55—60%，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 1/5 占制成品贸易的 2/5。仅仅 110 年英国以其蒸汽机、纺织机和钢炉发明等先进技术发动的工业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从而依靠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牢牢地盘距欧洲乃至世界达两个世纪之久。经济史学家认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实现了工业生产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的转变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接着，这场工业革命又迅速扩展到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历时一百年左右西方各国得益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推进与变革，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各国用各种工具机和蒸汽机代替了手工工具，用机械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几十倍或上百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行业部门的改造，创造了制造装备机器的大工业体系，并使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工场制度。这场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而且也带来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的成果使世界大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起飞”时期。这些国家由于经济份额在世界的比例急剧增长而迅速地崛起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来看，由后发展国家到实现大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其经济“起飞”到“成熟阶段”都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点。

第一，制度创新和生产关系变革是引发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西方工业革命是随着科学中心的转移而兴起的。而近代科学本身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中国明清时期出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状态，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在迅速发展。在西方，意大利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最早的国家，也是欧洲近代史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思想解放运动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从各个方面展开批判。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学说，堕入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的科学，终于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在西方经历了漫漫长夜，从希腊时期显赫高峰跌入中世纪的黑暗深渊，又再度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资产阶级革命中心的转移，使科学革命的成果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不断扩展，使先进生产关系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形成有机地结合。从西方科技经济转移的轨迹来看，各主要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经历了制度变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推移过程（见表 1—3 所示）。

表 1—3 西方国家制度变革与科学工业革命的转移

国家	制度变革	科学革命	工业革命	
			起飞期	成熟期
英国	1640—1688 年	1660—1730 年	1783—1802 年	1850 年
法国	1789—1794 年	1770—1830 年	1830—1860 年	1910 年
美国	1775—1783 年	1920—	1843—1860 年	1900 年
德国	1848—1871 年	1810—1920 年	1850—1873 年	1910 年
日本	1868—		1878—1900 年	1940 年

资料来源 根据 [美] 罗斯托：《经济发展的诸阶段》等资料整理。

这证明，制度变革和科技经济的互动作用的增强，是使工业革命在西方各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从春秋到宋代 2000 年左右时间，科学发展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又从 15 世纪开始衰落，并导致经济的惊人倒退，其原因不仅是与

国内政治动乱和政治腐败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封建制度的长期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作为大国竞争导致盛衰变化的分水岭，工业生产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变化，反映出制度变革和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正是中国明清时期，制度变革遭受到封建制度的扼杀，中国生机勃勃的科学逐渐失去活力，开始走向下坡路。工业经济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控制下，由世界的大国地位跌入衰落的境地。因而，世界大国盛衰演变表明，制度变革引起的生产关系变革，以及对科技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对大国崛起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二，西方国家对外掠夺式经济扩张和殖民地军事经济一体化，是其在世界力量对比和经济地位关系变动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的崛起，有其制度变革，科学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影响，也有西方国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发动战争实施掠夺式经济扩张以及殖民地军事经济一体化的因素。历史上，西方列强总是通过军事霸权、发动战争，进行殖民地争夺，以达到在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愿和规则强加于被掠夺国家，维护其赤裸裸的霸权利益（见表 1—4）。

表 1—4 西方争霸战争与霸权控制期

全球战争	霸权控制期	衰落
1494—1516	葡萄牙 1516—1540	1540—1580
1580—1609	荷兰 1609—1640	1640—1688
1688—1713	英国 1714—1740	1740—1792
1792—1815	英国 1815—1850	1850—1914
1914—1945	美国 1945—1973	1973—

资料来源 乔治·莫德斯基：《世界政治的长周期》 1987 年版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描述过 19 世纪西方国家在殖民战争时巧取豪夺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他指出：“它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海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例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① 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上称霸的同时，不断扩大殖民帝国，开辟国外市场，推销工业产品，掠夺廉价工业原料，积极对外侵略和扩张，把落后的国家变为它们的殖民地。1800 年，西方占领或控制的世界陆地面积为 35%，到了 1878 年比例上升到 67%，而到了 1914 年西方列强侵略成性，占领或控制的殖民地面积达世界陆地面积的 84% 以上。仅英国拥有的殖民地占全球面积的 1/4，占各列强侵占殖民地领土的 1/2。作为工业革命最大收益国的英国，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强国和对外侵略的急先锋。在完成对印度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后，1840 年对中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迫使中国以失败和屈辱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 1842 至 1919 年的 77 年，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 709 个，其中属中英之间的就有 163 个，到了 1949 年这种不平等条约竟达一千多个。各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西方列强大发横财。它们一方面破坏中国关税自主权，向中国

^① 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

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工业原料和土特产，把中国完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清政府因为巨额赔款造成的财政困难，争先向中国输入资本，把中国化为资本输入和工业品输入的场所，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同时，西方列强大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侵占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到1949年割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19亿5千3百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6倍、1901年全国工矿总资产的82倍，同时还欠外债62亿多银元，其中约有88%为军事、政治性恶债。^① 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榨下丧失了大国的地位。而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及第三世界各国掠夺、侵略和殖民地化的过程，攫取它国高额利润，控制它国财政，掠夺它国原材料，使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这种掠夺式的开放经济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对殖民地国家造成的长期损害和经济实力衰败的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化和大国的地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在殖民地国家的大掠夺、大瓜分及其依靠“损人利己”的经济扩张攫取的巨大贸易顺差加快列强力量更替和均势的变化，也造成了西方列强在经济军事上的强盛。同时，也与作为一个原来世界上大国地位盛极而衰，突然败落消失之间建立起来的必然的联系。

第三，科技革命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纵观大国由衰到盛，迅速崛起，一般都起因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结合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为西方大国科技

^① 引自霍英东：《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人民政协报》1997年4月14日。